

先秦『说』体文

叙事传统研究

／中／华／女／子／学／院／学／术／文／库／
张瑞◎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先秦『说』体文

叙事传统研究

／中／华／女／子／学／院／学／术／文／库／

张瑞◎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先秦“说”体文叙事传统研究 / 张瑞著. —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2015. 7

(中华女子学院学术文库)

ISBN 978 - 7 - 5161 - 6620 - 8

I. ①先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古典小说 - 小说研究 - 中国 - 先秦时代 IV. ①I207. 4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61071 号

出 版 人 赵剑英
责任编辑 任 明
特约编辑 李晓丽
责任校对 张依婧
责任印制 何 艳

出 版 **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**
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
邮 编 100720
网 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
发 行 部 010 - 84083685
门 市 部 010 - 84029450
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

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
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10 × 1000 1/16
印 张 12. 5
插 页 2
字 数 212 千字
定 价 48.00 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
电话: 010 - 84083683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序

张瑞博士的这本书，从历史的积尘中挖出来一个久被忽略的文体，那就是“说”。

“说”体产生并兴盛于战国。当时的诸侯列强，彻底撕掉了春秋时期宗周尊王的面具，为争夺天下而互相火并、大打出手。作为知识阶层的“士”也不甘寂寞，他们席不暇暖、灶不黔突，忙碌地游走于列强之间，凭着一寸三寸之舌，不遗余力地兜售、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，以协助人主问鼎天下，成就帝业。所以，那年头人们最直观而痛切的感受，在现实生活层面上是铺天盖地的战火，在文化层面上便是同样铺天盖地的辩士的游说。刘知几《史通》有云：“战国虎争，驰‘说’风涌”，说的就是当时情况。

因为“说”是当时的文化热点，“说”体也成了最盛行的文体形式，《荀子》中的《非相篇》、《韩非子》中的《说难篇》，还有《鬼谷子》等书中，都对“说”的内容形式、艺术技巧作过专门的讨论。对于那时涌现出来的大量的“说”，当时就有人加以搜集，如《韩非子》中有内外《储说》。韩非本人就是一名“说”客，所谓“储”，就是把自己讽谏人主的“说”储集起来以备用的意思（《韩非子·内储说》题下注：“储，聚也，谓聚其所说”）。“说”搜集多了，似木聚而成林，土积而为山，此即《韩非子》中的《说山》《说林》篇名之所出（《韩非子·说林》题下注：“广说其事，其多如林，故曰说林”）；西汉刘安所主编的《淮南子》中，也有名为《说山训》《说林训》等篇目，他袭用了韩非的山、林之喻，再一次对说体文进行了集辑。稍后的刘向，对先秦文献的整理和流传具有大功绩，他在整理群书的同时，也编了一部《说苑》，是在更大范围上对说体文的结集，“苑”，为园苑之意，园苑中有山有林，它由山、林组成而涵括山林。故《说苑》之命名，是强调“说”的聚集更多，搜集

更广。此外刘向还编了一部《战国策》，虽然没有直接用“说”的名称，可里面所收的也都是说体文。

说体文具有鲜明的特点。陆机在《文赋》中将古来文体釐分为十种，即诗、赋、碑、诔、铭、箴、颂、论、奏、说。“说”体赫然占有一席。而在谈到文体特点时，陆机把“说”与“奏”相对，作了这样的界定：“奏平彻以闲雅，说炜晔而譎诳”。所谓“奏”，是谋臣写的正式奏章，因为它是呈阅给国君的正式文本，要入档备案，故宜稳妥可靠，内容上要求平和通彻，风格上强调从容雅正，此即“平彻”“闲雅”；而“说”，因为是战国游士对人主口头的谏说，它以感人为期，而且求效用于即刻，要有煽动性，故不妨恣放和虚夸，所以陆机用“炜晔”“譎诳”来界定它。

所谓“炜晔”，即鲜明生动，夺人眼球。说客的谏议，是以洗脑的方式对人主的征服，为了能打动人主的心，使他能接受自己的意见，说者的“说”必须有勾魂摄魄的魅力，《荀子非相》讲当时辩士的谈说之术，要“譬喻以称之，分别以明之”；《鬼谷子》谈“说”的特点，是“其言神而珍，白而分，能入于人心”；《韩诗外传》中托孔子论说者之出语：要“欢忻芬芳以送之”，其实都说的是说体文的这方面特点。

而所谓“譎诳”，则指虚构。战国辩士的说辞，为了增加说服力，往往举事以证理，而其所叙之事并不受事实的限制，许多为蓄意编造，大似骗人的诳语。宋人叶大庆著《考古质疑》，其中曾摭取《说苑》中的说者所讲的许多故事，以事实考之，结果发现多为杜撰，“时代先后，邈不相及”。比如《说苑·复恩篇》说孔子夸赵襄子有善赏之德；《善说篇》亦载赵襄子当面奚落孔子，而据历史年代一考核，孔、赵并非同一时代的人，孔子卒后多年才有赵襄子。《正谏篇》载某隐士以“吴不用子胥而越并之”来警戒楚庄王，而实际上，越王勾践之并吴，发生在楚庄王死了一百八十年之后。这种脱离事实的凭虚杜撰，是历史家最为讨厌的，所以刘知几在《史通·杂说》中痛斥《说苑》，指其“广陈虚事，多构伪辞”。其实，“说”中虚构故事，不可全视为谈说之士对有国者的恶意“忽悠”，因为说者在讲故事时，并没有要求人主把它当作事实来接受，它只是为了证明其所说的道理权宜而用的辅助手段，换句话说，故事在“说”中只有比喻性、托喻性，《韩非子·说林》中讲过楚人的“滥竽充数”、郑国的“郑人买履”等故事，而这些故事并非纪实，它与韩非同时所讲的“二虱相讼”“二蛇对话”等寓言故事性质相同。研究六国时的文

献，经常会接触其中对历史事实的托喻性的记载，这与战国士人的“文德”没有关系，而正像近人傅斯年所说的，它只是当时士人言说的一种流行方式，是当时文体的一种要求。

叙事与虚构，是小说这种文学样式的特点。中国人的小说观念成熟较晚，尤其是对于虚构之合法性的承认。在古文字中，叙事的“事”与“史”是一个字，这使人们在潜意识中固执地认为，被叙说和记载的一件事情，总应是有根有据的史实。所以，本来是出于虚构的一段叙事，国人也一直以“故事”相称，故事即古事，也就是古代发生过的事情。这是潜意识中对“事”与“史”的混淆。与此相应的，对于作家创作的小说，也就要求它必须纪实，否则即不能接受，甚至斥为胡诌。清代的纪晓岚，曾多次以纪实为标准攻击《鸳鸯记》《聊斋》等小说中的虚构情节，以“谁见之而谁言之”的责问来斥其瞎编。清代已接近现代，人们对小说的虚构态度尚且如此，更不用说中古以前了。陆机提到“说炜晔而譎诳”以后没多久，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论说》中，就对陆机的说法进行了攻击：“凡说之枢要，必使时利而义贞，自非譎敌，则唯忠与信。披肝胆以献主，飞文敏以济辞，此‘说’之本也，而陆机直称‘说炜晔而譎诳’，何哉！”他故意把陆机的“说”从固定的文体曲解成一般的劝谏行为，说臣下劝谏君主态度要贞正诚实，不能够蓄意欺诳，从而不但否定了陆机，而且把陆机所肯定的“说”的虚构原则也给否了。这反映了我国正统文人对于艺术虚构长期以来所持有的保守立场。

正是出于这种立场，先秦战国说体文的叙事性和在叙事中虚构的特征，在中古以后很少被人注意。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中记载过一件事，苏轼考进士作试题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，曾有意使用过辩士说体文“炜晔而譎诳”的笔法，这是我见到的唯一的一例。苏轼在试卷中为了证明自己的论题，曾举上古之事：“当尧之时，皋陶为士，将杀人，皋陶曰杀之三，尧曰宥之三。”主考官欧阳修阅卷时不知此事出于何典，但看文章中所反映的学识，断定此事不会是杜撰：“此郎必有所据，更恨吾辈不能记耳。”后来见面时问他所引故事的出处，苏轼说：“以意为之，何须出处！”对这件事，陆游固然是抱着对苏轼为人放任倜傥的赞颂态度来记的，但从欧阳修“必有所据”的预断来看，当时的文人早把战国说体文曾盛行一时的“譎诳”完全忘记了。

中国小说观念成熟虽晚，但其文本源头却可以追溯得很早，说体文中

的叙事和虚构都可以看作小说的滥觞，在我国叙事文学漫长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。张瑞博士此书，运用《文心雕龙》的“释名以章义，原始以表末，选文以定篇，敷理以举统”的方法，从概念辨析、历史追溯、例文剖析等方面对“说”体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，在叙事和虚构两方面指出它与后世小说的关系，应该说，她在学界长期以来有关小说源流的考察链条上，补上了重要的一环，在文学史、文学思想史的研究上具有很高的价值。我衷心祝贺她通过踏实的努力所取得的这份厚重的成果得以面世，并希望她再接再厉，在学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。

李壮鹰

2015年4月5日于北京师范大学紫雪居

目 录

绪论	(1)
一 先秦散文研究状况及本书的切入点	(2)
二 本书的研究对象, 研究方法及主要内容	(10)
第一章 释名以章义: 先秦说体文的命名与所指的确定	(13)
第一节 先秦说字本义及其命名的合理性	(13)
一 先秦说字训	(13)
二 从先秦“说”字义看本文中先秦说体文的形态	(22)
第二节 命名的困惑——历代先秦说体文研究综述	(25)
一 相近的命名——语类、语、语体文研究视野中的说体文 研究综述	(25)
二 相同的命名, 不同的所指——说体文研究综述	(29)
第三节 正名——魏晋南北朝说体文研究中的模糊认识辨析	(35)
一 魏晋南北朝人对先秦说体文的认识	(35)
二 魏晋南北朝说体文认识辨析	(37)
三 魏晋南北朝说体文名实校正	(50)
第二章 原始以表末: 先秦说体文的形成及演变	(54)
第一节 先秦记言传统与说体文的形成	(55)
一 记行之文	(56)
二 记言之文	(58)
第二节 先秦口说传统与说体文	(64)
第三节 史传散文与说体文	(72)
一 《左传》的文体综合性与说体文在其中的位置	(73)
二 先秦说体文与《史记》	(83)

第三章 选文以定篇：先秦说体文存在形态及特征	(90)
第一节 先秦典籍中的现实存在	(90)
一 先秦说体文的存在形态	(90)
二 先秦说体文在文献中的具体存在范围	(93)
第二节 先秦说体文文体的发展及特征	(106)
一 先秦说体文的文体发展过程	(106)
二 先秦说体文的叙事性特征	(111)
三 先秦说体文的文体结构特征	(115)
第三节 先秦说体文的内容特征	(119)
一 先秦说体文的历史题材特征	(119)
二 先秦说体文中的深层意蕴	(123)
第四章 敷理以举统（一）：先秦说体文的叙事特征	(128)
第一节 先秦说体文中的人物分析	(128)
一 作为行动元的人物及其意义	(129)
二 作为性格的人物形象	(133)
第二节 先秦说体文中的艺术表现手法	(138)
一 叙述者与叙述视角	(138)
二 场景描写	(140)
三 言辞表现技巧	(143)
第三节 独特的插入文本——人物语言	(148)
一 插入文本所造成的戏剧性效果	(149)
二 插入文本的材料来源	(150)
三 插入文本中的叙事	(154)
第五章 敷理以举统（二）：先秦说体文的虚构特征	(158)
第一节 貌似史实的虚构叙事	(158)
第二节 先秦说体文中的细节虚构	(170)
第三节 先秦说体文虚构叙事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	(176)
一 先秦说体文虚构特征的演变与存留	(176)
二 先秦说体文中的虚构对后世小说虚构产生的意义	(178)
结论 先秦说体文叙事传统——中国古代小说的文体渊源之一 ...	(180)
主要参考文献	(185)

绪 论

本书研究的是先秦散文中颇具特色的一类文体，即在汉语文本传统中，融合文字材料与口头传说之后形成的最早叙事文。

章学诚在《文史通义》中说：“三代以上，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；三代以下，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。夫记注无成法，则取材也难；撰述有定名，则成书也易。成书易，则文胜质矣；取材难，则伪乱真矣。”^①按此，则先秦说体文正是在“记注无成法，撰述有定名”之时产生的撰述之作。“记注有成法”，使春秋以前形成的文字材料，都具有档案记录的性质，或记事，或记言，以事言为主，无意于文章体制，因此，“撰述无定名”；由于文随事转，所记录的文字材料，尚未形成某一特定类型的文体，参考《尚书》，便知此言不虚。三代之后，记注之法坏，所取之材^②，即最真实的第一手原始记录材料，便不易获得；即使得到，由于是残篇断简，没有足够的文献相参照，变得不易理解，遂不得已从传说中借用相关背景加以补充完整，形成首批所谓“撰述”之作，故“取材难，则伪乱真矣”。不可考的传闻与真实的材料相混杂形成“撰述性”文本的情形，是追求历史真实的史学界的损失，但却是追求文本创作丰富完美的文学界的契机，中国散文文本传统由此开始从早期单纯的文字记录材料，向有作者主观理解与精神追求渗入的著作文章转化。在这种转化过程中，逐渐形成了一种融合了材料与记忆的叙事性文体，这种文体成为一种模式，在战国时期蓬勃兴起，“撰述有定名，则成书也易”，并在其中出现了一些文学性手法的萌芽，如布局、情节、人物描写、夸张、虚构等，

① 章学诚：《文史通义·书教上》，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，第7页。

② 此处章学诚是从史学角度来说，自然记注之法坏后，能够被视为第一手材料的原始记录就少了，是为“取材难”。

遂使章实斋有“文胜质”之叹。这些手法，正是后世更为成熟的文学叙事文体中不可或缺的。但长期以来，这类文体却并未得到人们的关注。

一 先秦散文研究状况及本书的切入点

从结构体制，即文章体裁的角度，对先秦散文进行的研究归类，自古以来就比较罕见。这与对后世散文以文体进行分门别类，再作细致研究的情形，形成明显的差异。本书研究的切入点，即是从文章结构体制的角度对先秦文体进行分类，继而发现的一种早期叙事文体。而这也正是长久以来，先秦散文研究中所忽略的问题。

中国古代对文章进行分类的概念，最早要追溯到对言辞依据其内容及功能的不同进行分类。言辞的分类，早于对文章的分类，同时它的分类标准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后来文章分类的观念。

先秦时期的人们，已经根据言辞的不同功能对其进行了基本的命名和分类。目前能够收集到的材料证明，早期的分类是根据语言的不同场合、不同功能和内容进行自然区分的，这些言辞被文字记录下来，就会自然成为不同的类别。根据当时社会状况，西周以前涉及比较重要社会生活内容的言辞大致有卜辞、祝词、军国之辞、乐辞（诗）等。其中，乐辞即是“诗”。卜辞形态可见于甲骨文及《易经》卦爻辞。祝词是用于各种祭祀时的言辞，如《周礼·春官》中所记大祝掌六辞：“大祝掌六祝之辞，以事鬼神祇，祈福祥，求永贞。一曰顺祝，二曰年祝，三曰吉祝，四曰化祝，五曰瑞祝，六曰策祝。掌六祈以同鬼神祇，一曰类，二曰造，三曰禴，四曰禋，五曰攻，六曰说。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，一曰祠，二曰命，三曰诰，四曰会，五曰祷，六曰谏。”^① 此外还有当时用于军国大事，政治活动的言辞，如《尚书》中的《汤誓》《牧誓》《秦誓》等。其他语言活动也有不少，据《国语·周语上》中所述：“……天子听政，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，瞽献曲，史献书，师箴，瞽赋，矇诵，百工谏，庶人传语，近臣尽规，亲戚补察，瞽、史教诲，耆、艾修之，而后王斟酌焉。”^② 足见当时君王身边的语言现象就可分为：诗、曲、书、箴、赋、诵、谏、

^① 孙诒让：《周礼正义》，中华书局1987年版，第1985页。

^②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：《国语》，上海世纪出版有限公司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9—10页。

语等几类。这种由言辞的不同功用而来的分类方法，在形成记录性质的文本材料之后，大多仍然被沿袭下来，以命名不同的文体。

以文字形式存在的文本名称，早期多统称为“书”，并不特别在意其专名。春秋以前，根据载体的不同，所欲留传后世的文字多“书其事于竹帛，镂于金石，琢之槃盂，传遗后世子孙”^①。在春秋以前，由于书写储存成本的高昂，以文字记录并流传下去，是上层统治阶层的专利，能著之竹帛的多为国家大事。这些文献，尚未有名的，均称之为《书》，前面冠以时代以示区分，如《左传》中多次出现的《虞书》《夏书》《商书》《周书》等即是。由于“书”在当时，还可以作为动词，意思为“写下”，因此，凡是被文字书写之作都可称为“书”，故“书”也可作为早期载之竹帛之作的统称。《墨子·明鬼下》有“《周书·大雅》有之……”^②的说法，可见当时因《大雅》在《诗经》各部中较早形成于文字以流传，故也能以《周书》来称呼《诗经》，足见春秋战国之际“书”的范围之广。

在无所不包的“书”的总名下，人们在之前区分言辞类别的经验基础上，根据其不同的功能和对象，进行了类的区分，并加以命名，从而成为最早的文体分类方法。就春秋时期已有典籍来看，当时的文献资料已经比西周时大为丰富。《国语·楚语上》申叔时谈到太子之教时，说：“教之春秋，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，以戒劝其心；教之世，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，以休惧其动；教之诗，而为之导广显德，以耀明其志；教之礼，使知上下之则；教之乐，以疏其秽而镇其浮；教之令，使访物官；教之语，使明其德，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；教之故志，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；教之训典，使知族类，行比义焉。”^③ 里面涉及用来教育太子的科目就有《春秋》《世》《诗》《礼》《乐》《令》《语》《故志》《训典》九种。这些为春秋时贵族史官所熟悉的文献典籍，在春秋后期，经过孔子整理的一部分成为经典，流传至今，对后世具有很大的影响；其中的另一部分，在流传过程中散佚，篇章残缺；还有一些完全失传。在战国中后期，

① 孙诒让：《墨子间诂》，中华书局2001年版，第206页。

② 同上书，第238页。

③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：《国语》，上海世纪出版有限公司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528页。

喜欢称引典籍的，主要是儒、墨两家。墨子好读古书，其论事之三表法^①其一便是上引古事，《墨子·贵义》中提到他南游至卫的途中，还不忘带书以随时观看。^②但由于他对文献的态度与孔子不同，故不曾加以整理，文中所引古书名称颇为混乱，除《诗》以外，文献类有以朝代区分命名的《夏书》《商书》（《殷书》）、《周书》等；有以具体内容区分的《先王之宪》《先王之刑》和《先王之誓》；也有系年记事类《相年》《距年》《暨年》《春秋》《三代》等；此外还有《语》《法》《传》《图》等类书籍。荀子作为儒家代表人，其称引的典籍，也具有一定代表性，《荀子·劝学》中说：“《礼》之敬文也，《乐》之中和也，《诗》《书》之博也，《春秋》之微也，在天地之间者毕矣。”^③《荀子·儒效》：“圣人也者，道之管也。天下之道管是矣，百王之道一是矣。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。《诗》言是其志也，《书》言是其事也，《礼》言是其行也，《乐》言是其和也，《春秋》言是其微也。”^④可见其时儒家所推崇的主要典籍名称为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春秋》。写作于战国晚期的《吕氏春秋》，作为杂家综合性著作，颇具代表性，其中所称引的典籍有《诗》《易》《商箴》《周箴》《夏书》《商书》《周书》《志》《故记》《史记》；口头歌谣有诵、歌、辞等，实用性文书有命、令、盟、书、法等。这些典籍名称虽然与后世习用的称呼不同，显得颇为混乱，而且出现一文多名，或同名异文等现象，但可视其为最早的书籍分类现象，其中体现出以功能和内容进行分类的标准，以文章结构体制进行分类的意识尚未出现。

以上所述先秦时期对文献典籍的分类，基本上都是按照文献的主要内容及其不同功用进行大类的区分。这种区分虽然在达到分类目的之外，也自然区分了一些文体，比如诗之韵文和书之散文，但终究还是不经意的收获。文本的有韵无韵，是记叙、描写为主还是议论为主，均未得到相应的

① “三表法”见《墨子·非命上》：“故言必有三表。何谓三表？子墨子言曰：有本之者，有原之者，有用之者。于何本之？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。于何原之？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。于何用之？发以为刑政，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。此所谓言有三表也。”其中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，从《墨子》书中依此相关论述来看，均引用古籍为证。见孙诒让《墨子间诂》，中华书局2001年版，第266页。

② “子墨子南游使卫，关中载书甚多”。同上书，第445页。

③ 王先谦：《荀子集解》，中华书局1954年版，第7页。

④ 同上书，第84—85页。

关注，特别是对散文的文体分类，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。在编辑文献时，人们更注意的是内容方面的因素。

秦始皇焚书坑儒，只留占卜、治病、种树之类的书，颇得儒家推崇的《诗》《书》受到了极大的损害。汉文帝后逐渐开始注重收集整理先秦典籍，至汉武帝时，已建立了国家收藏图书的制度，任命整理抄写图书的官员。成帝时，在进一步收集民间散佚图书基础上，诏令刘向整理经传诸子诗赋，任宏整理兵书，尹咸整理术数类书，侍医李柱国整理方技。“每一书已，向辄条其篇目，撮其旨意，录而奏之。”^①刘向卒后，其子刘歆依向所奏，总结群书，著为《七略》，其中有“辑略”“六艺略”“诗赋略”“诸子略”“兵书略”“术数略”“方技略”七个部分，开后世图书分类先河，影响深远。然已逸，东汉班固依其旧制，作《艺文志》，除《辑略》外，仍将图书分为六艺、诗赋、诸子、兵书、术数、方技六大类。其中涉及先秦时期的文献，除方技、术数、兵书、楚辞以其内容分别归类外，其余文献均被归入六艺及诸子类中。这种区分的背景，是汉代独尊儒术的结果，并不能体现文体自身的区别。六艺作为儒家推崇的经典，变得极为驳杂，因此又具体分为易、尚书、诗、礼、乐、春秋、论语、孝经、史籀九类，这种小类的区分，是在儒家经典的大科目下，以表现内容的不同为主来进行区别的；诸子类，又进一步分为儒家、道家、阴阳家、法家、名家、墨家、纵横家、杂家、农家、小说家10种，它们之间的区别，是以所持观点不同为依据进行划分的。因此，《艺文志》对先秦散文所进行的分类，基本上与文体特征无关。但由于汉代是历史上首次对先秦典籍作大规模整理时期，汉代人所使用的这种分类方法，对后世影响很大。

东汉末期，随着封建国家文教体制的完备，文章写作日趋繁荣。旧有的文献分类方法已经无法满足人们区分文章以创制其体的需要，于是出现了更为细致的文体分类。在对现存《尚书》诸篇目的分类中，汉代孔安国在《尚书序》中，把《尚书》分为典、谟、训、诰、誓、命六种文体^②，而在其之后唐代孔颖达在《尧典正义》中，更细致地分为典、谟、贡、歌、誓、诰、训、命、征、范十种文体。^③这些文体之间的区别依

① 班固撰，颜师古注：《汉书艺文志》，商务印书馆1955年版，第2页。

② 《十三经注疏·尚书正义》，中华书局1980年版，第114页。

③ 同上书，第117页。

据，主要在内容及言辞的不同功用上：典，一般而言是记载君王言论和事迹的文章；谟，主要记载君臣之间策划、谋议大事的谈话；诰，主要记载君王或地位较高者对他人的劝告教诫之词；训，是臣下劝导君王以历史为借鉴，改善统治的劝教之词；誓，是君王诸侯在征战前率部誓师之词；命，是对君主或官员接管理职位的任命之词及其情形的记载。据《左传·文公十八年》载大史克之言，提到“先君周公制周礼曰……作《誓命》曰……”^①的情况来看，这些文体所依据的言辞之区分在春秋以前就已经存在了，但是将其视为文体的类别差异则要到东汉时才出现。

这一现象在对应用文的分类中，体现得格外清楚：东汉蔡邕在《独断》中，将帝王所制命令，分为策书、诏书、制书、戒书四类，各有其不同用途，其总名又有命、令、政三个；臣子对帝王上书言事，也有四类：章、奏、表、驳议。^②汉末刘熙在《释名·释书契》中有“檄、谒、书、券、策、符”六种，《释典艺》中则收录了公文之外的其他文体：“令、诏、论、赞、叙、铭、诔、谥、碑、谱”十种。^③有这些认识为基础，与其年代相隔不远的曹丕在《典论·论文》中便有了“夫文本同而末异”的文体分类观念，继而分文为四科八类：奏、议；书、论；铭、诔；诗、赋。^④但这些新的分类方法主要针对汉代以来用于日常社会生活中的文章，而较少涉及对先秦文章的归属问题。

因此，用魏晋以来新兴的，意识到文章在结构体制、表现手法等方面差异，并以此为标准去区分先秦文章的情况，只有在文体论较为成熟的《文心雕龙》和《文选序》中方可见到。陆机在这个时期是较早继承曹丕的文体分类观点，对文体进行区分的论者，他在《文赋》中，将文体分为诗、赋、碑、诔、铭、箴、颂、论、奏、说十种，并对各自特点作了简单概括。^⑤这一文体论思想，经虞挚、李充在《文章流别论》和《翰林论》中的扩充，至刘勰而蔚为大观。在《文心雕龙》中，刘勰共分了诗、乐府、赋、颂、赞、祝、盟、铭、箴、诔、碑、哀、吊、对问、七、连珠、谐、谑、史传、诸子、论、说、檄、移、封禅、章、表、奏、启、

① 李梦生：《左传译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418页。

② 蔡邕：《独断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，第4页。

③ 刘熙：《释名》，中华书局1985年版，第95—101页。

④ 曹丕：《典论》，中华书局1985年版，第1页。

⑤ 张少康：《文赋集释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99页。

议、对论、书记等三十二个文体。在论及各体文章时，往往首先追溯其源头，这一行为本身就带有认可文体继承性的前理解，因此也涉及了对先秦文体的整理分类。但由于只是兼故，很多问题只是附带而过，泛泛提及，并未作更深入的论述，特别是关于先秦说体文的理解，还存在一些值得商榷之处。关于这一点，后文有专节论及。萧统主编的《文选》，在其序言中，将所有典籍分为诗经、楚辞、儒家经典、诸子、先秦说辞、史传、“篇翰”七大类，而只以“篇翰”作为收录对象。^①虽然不录先秦“说”体，但这种区分方法及其观念，还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。

开创于魏晋，确立于《隋书·经籍志》的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分类法，^②在文献分类上影响重大，先秦典籍多数被归入经、史、子部当中，而后世论文者又多以集部诸文献为研究对象，因此，在唐以后的分体文章总集中，罕见以文体为标准对先秦散文进行区分，刘勰、萧统所开创的以文体区分先秦散文的思路不再有人继承，如《文苑英华》《唐文粹》《宋文鉴》《元文类》中所涉及的各体文章，都不再涉及先秦散文。

独清代姚鼐在《古文辞类纂》中，将古文分为论辩类、序跋类、奏议类、书说类、赠序类、诏令类、传状类、碑志类、杂记类、箴铭类、赞颂类、辞赋类、哀祭类十三种，并在序中追溯其源头到先秦，但多不录，录有先秦文章的只有奏议类和书说类。在“奏议”类序中说：“奏议类者，盖唐虞三代圣贤陈说其君之辞，《尚书》具之矣。周衰，列国臣子为国谋者，谊忠而辞美，皆本谏诤之遗，学者多诵之，其载春秋内外传者不录，录自战国以下。汉以来有表、奏、书、议、上疏、封事之异名，其实一类。”^③在其“书说”类序中说：“昔周公之告召公，有《君奭》之篇。春秋之世，列国士大夫，或面相告语，或为书相遗，其义一也。战国说士说其时主，当委质为臣，则入之奏议。其已去国，或说异国之君，则入此编。”^④此外，还将论辩类的源头追溯到先秦诸子；序跋类的源头追溯到孔子所作《系辞》以及《说卦》《文言》《序卦》《杂卦》之传；赠序类的源头推及颜渊、子路的以言相赠；诰命类，源于《尚书》之誓；碑志类源于周之石鼓刻文；铭箴类，亦“三代以来有其体”矣；辞赋类也作

① 萧统：《六臣注文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，第3—5页。

② 乔好勤：《中国目录学史》，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，第97、147页。

③ 姚鼐：《古文辞类纂》，中国书店1986年版，第6页。

④ 同上书，第8页。

于战国时楚人，不仅是屈子之赋，有韵无韵均可，只要是设辞无事实，义在托讽，便可视为辞赋类；哀吊类源于《诗经》中《黄鸟》《二子乘车》。可以说，他继承了刘勰文体论“原始以表末”的方法，按后世的文体分类情况，对先秦文体进行了追溯，涉及了先秦文献文体的区分，其中一些见解颇为新颖，可惜的是由于其着眼点在后世的文章类别，先秦文体只是泛泛提及，并没有作更为细致深入的考察；同时，姚鼐的《古文辞类纂》意在选取文章，以为学者之准的，并非以文体区分及其理论总结为重。

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，在学科始建之初，依然延续了几千年来的经学传统，将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《左传》《诸子》《楚辞》等经、史、子书作为先秦文学研究的对象。起初，1910年的京师大学堂《中国文学史》，虽辟专章论述先秦文体，但仍不脱经、子、史圃别分类的窠臼^①；同年刊行的中学教科书《中国文学史》中将早期典籍分为记载文、典制文、韵文、论理文四大类。记载文包括《纪年》《世本》《尚书》，其后发展为《春秋》《左传》《国语》《战国策》等；典制文主要是各种礼经；韵文主要是《诗经》；论理文主要是《易》系列。至战国时，又出现诸子文学和辞赋文学，诸子文学包括儒家、道家、法家、纵横家、墨家、名家、兵家、杂家、农家；辞赋文学包括屈原所作楚辞，以及宋玉、荀卿等人所作小赋。^②可见其著者所持的是泛文学观，虽然论述重点已经从内容转移到文章形式、风格方面来，但中国典籍的传统分类方法仍然占有很高的地位。较新之处，在于用记载文、典制文、韵文、论理文等文体类型，对先秦典籍进行了归类。对先秦文学的这一研究方法，被后来的文学史研究者所继承。如1929年曾毅《中国文学史》和1930年葛遵礼《中国文学史》^③，不论如何分类，均以六经、史传、诸子区分先秦散文，分析时不讲传统的经学思想，而是侧重文章形式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其不同的风格特点作出总结：“儒家重实践，其文多平实。道家主想象，其文多超逸。法家尚刻，其文多峻峭。纵横家尚辞令，其文多敷衍宏放。其他墨家之文质，名家之文琐，杂家之文博，……孟轲之文如长江。庄周

① 陈平原：《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。

② 参见《中国文学史》（中学校教科书），出版地不详，1914年版。

③ 参见曾毅《中国文学史》，泰东书局1923年版；葛遵礼《中国文学史》，会文堂书局1930年版。